

旅澳具臺灣背景家庭之語言維護與身分認同

蔡佩舒* 祁越 蘇珊娜·伊森許拉斯 安德莉亞·沙利

摘要

本研究探討移居澳洲的臺灣家庭於假期讓子女回臺接受正規教育，在不同教育制度之間轉換對子女的語言能力和身分認同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旅澳具臺灣背景的家庭家中語言使用情形及維持華語學習環境的原因，再透過訪談形式了解父母對於子女華語教育的看法，探討子女在臺灣澳洲兩地往返過程中的身分認知情形。雖只有母親願意代表受訪，研究結果可見父母輩對於故鄉語言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執着，也觀察到子女在兩種文化和語言之間自我身分認同的逐漸轉變。父母輩堅持讓子女接收兩種教育制度，其目標不僅為提升子女的華語語言能力，也希望提高子女對臺灣的身分認同。但訪談的結果也發現，子女已經逐步產生個人認同，與父母輩的感受不一致。本文透過探討臺灣家庭往返臺灣與澳洲兩邊教育制度的經驗，希望提供家長和語言教育工作者關於華語學習，來自身分認同觀點的些許建議。

關鍵詞：語言管理 身分認同 短期旅居 澳大利亞 華語

* 蔡佩舒，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聯絡電郵：pst@cc.ncue.edu.tw。（本文通訊作者）

祁越，梅西大學人文系，聯絡電郵：G.Qi@massey.ac.nz。

蘇珊娜·伊森許拉斯，格拉菲大學人文、語言及社會科學學院，聯絡電郵：s.eisenclas@griffith.edu.au。

安德莉亞·沙利，卡爾斯塔德大學語言、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學系，聯絡電郵：andrea.schalley@kau.se。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文所指稱的旅澳家庭，家庭成員中至少有一人（本研究中為母親）是從臺灣移出的移民，家庭組成是臺灣人與外國人的婚生子女或是移民第二代，因長輩的期望而在長假期間返回父母成長的國家，以便維持跟親屬的溝通或維護文化根源。除了拜訪親戚，這些旅澳家庭返臺期間也會讓子女到校上課。因澳大利亞（澳洲）假期跟臺灣學制的放假時間不同，他們停留在臺灣的期間會在學校短期就讀或陪讀。他們所展現的外顯行為可能與積極參與遊學團的學生類似，都是離開原先居住的地方去接受短期的教育，但這些行為背後的理由可能並不單純為了增進語言與國際競爭力，還為了保持文化或身分的認同。

本研究的對象不同於過去探討往返於原生國家與旅居國之間的研究（Chen, 2008; Chiang & Liao, 2008; Salaff et al., 2008; Sussman, 2007, 2010）。過去的研究對象長期旅居國外至少十年以上，有些在青少年時期移民但待成年後返回原生國（Chen, 2008; Chiang & Liao, 2008; Salaff et al., 2008; Sussman, 2010），有些數十年後再返原生國定居（Sussman, 2010），有些子女多年住在英語國家受教育但家長並未同住（如 wild geese, Reed, 2015）或父親未同住（如 astronaut, Sussman, 2010, p. 64），但本研究探討的對象與家長同住，一年內往返臺澳兩地之間並在兩地都接受正式教育。過去的研究對象為青少年、成年人或退休人士，但本研究聚焦於五至十歲生長於澳洲的兒童，藉由訪談他們的母親收集數據。據筆者所知，至今鮮少有研究的對象與本研究相同。因此本研究希望從教育制度、環境、文化等面向，探討在兩種教育系統之間轉換對於語言能力和身分認同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1) 旅居現象

所謂旅居（sojourn），定義是非以短期觀光為目的，從一個國家旅居到另一個國家。旅居現象有許多可能的原因，包括移民、求學深

造、職場需求，可能隻身或以家庭方式群體前往（Koga, 2009）。至今為止，過去研究主要探討旅居人士對新文化的社會和心理適應（例如 Searle & Ward, 1990; Swagler & Ellis, 2003; Ward et al., 2001; Ward & Kennedy, 1994），但少有研究探討往返於原生國家與旅居國的家庭伴隨而生的教育與社會適應問題（但參照 Chen, 2008; Chiang & Liao, 2008; Salaff et al., 2008; Sussman, 2007, 2010）。

澳大利亞（澳洲）是臺灣主要移民的目標地之一。由於澳洲政府過去歡迎外國移民，許多歐洲、美洲、亞洲的移民都大量移往澳洲。至 1980 年代，澳洲的亞洲移民人口已經佔所有移民人口的 40%（Wu et al., 1998, p. 391）。自 1990 年開始，澳洲的昆士蘭州成為臺灣移民的最大目標地（Ip et al., 1998, p. 81），移民方式主要透過商業資源或商類專業技術移民（Wu et al., 1998, p. 393）。根據 Wu 等學者（1998）的訪談調查，臺灣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子女接受高質量的澳洲教育，其次是家庭因素、政治考量、尋求新工作機會等等。

以澳洲政府統計局公告的普查數據（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7），澳洲在家庭內使用的語言主要為英語，使用人口佔 17,020,417 人，佔第二名的語言是華語，含 927,944 人，勝過排名第三的印度伊朗語系（619,234 人）¹。若細分華語的使用率，國語（普通話）人數最多，佔 596,711 人，其次為粵語 280,943 人，剩下的華語一律歸為其他華語類。顯見在澳洲的華人比例眾多，這其中也包含了許多由臺灣移入的移民。

（2）跨國移民家庭的語言目的、挑戰、期許

Zhu 和 Li（2016）指出跨國和多語家庭最常見的模式是第一代移民發現學習新移民國家的語言既重要又富有挑戰。而他們在當地出生的子女或與其一起移民的子女被期待要維持父母輩的母語，無

1 澳大利亞統計局每 5 年更新一次數據。2017 年的公告為 2016 年的調查結果，是目前最新的數據。最近一次的普查於 2021 年執行，數據將於 2022 年 6 月 28 日開始對外逐步公佈。詳見：<https://www.abs.gov.au/census/2021-census-data-release-plans/2021-census-product-release-guide>

論在使用或學習也都對子女產生困難。如果涉及祖父母輩，事態就更加複雜。整體而言，這些挑戰包含了隔代語言轉移和社交方面的困難（Lanza, 2007; Li, 1994; Schecter & Bayley, 1997; Shin, 2004; Zhu, 2008）。在 Zhu 和 Li（2016）針對華語的研究報告中指出，跨國個人和家庭的經歷與挑戰是多樣化的，不可一概而論。維持語言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可以幫助這些個案理解他們所經歷的身分、意識形態的基礎和變化（Falicov, 2005; Levitt & Jaworsky, 2007）。所以，Zhu 和 Li 鼓勵更多對於跨國、雙語、多語領域，特別是針對複雜、多方位，對於個人、家庭經歷的全方面研究。

Curdt-Christiansen（2009）研究加拿大魁北克省 10 個華人家庭的語言政策規劃和發展，該研究認為家庭語言政策受到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強烈影響。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經歷、文化背景（比如：儒家思想）對父母主導的家庭語言政策有極大的影響，特別是父母對子女家庭語言維繫的期待和願景。Wilson（2020）的研究是關於在英國的法英跨國學齡兒童。該研究提出每個兒童的雙語經歷都具獨特性，子女在學習、維護和發揚傳統語言的觀點與父母的想法不盡相同。儘管受訪的子女都對家庭語言（法語）抱持積極的態度，但他們都表示自己仍然更願意說英文。這一點在 Barron-Hauwaert（2011, p. 54）中也有記錄，兄弟姐妹之間的常用語言通常是他們所在環境中使用的語言。鑑於孩子大多數時間都在英語環境中度過，他們彼此之間使用英文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在 Wilson（2020）的研究結論中可以看出，法語和英語對子女而言並非競爭關係，而是基於實用考量將兩種語言視為一種整體的現象。

Smith 和 Li（2020）發現，美國和加拿大社區的華語學校和課程日趨流行，講華語的父母通常基於各種動機因素，督促子女維護傳統語言。動機因素包括：文化認同、未來的經濟價值和機會，以及與其他家庭成員的溝通（Lao, 2004; Mu & Dooley, 2015）。例如 Lao（2004）在舊金山對 86 名華裔兒童的調查顯示，無論是以英語或是華語作為主要使用語言，父母都相當支持中英雙語教育，主因是他們認為雙語教

育有利於兩種語言的同步發展。不過，去雙語學前班上課並未讓子女與父母的交流加入更多的華語，可見上雙語班並未對子女的傳統語言使用和維護產生更實際的影響。

(3) 語言維護

家庭是維護語言的重要推手，尤其當大環境沒有提供支持的情況之下，對於非主流語的發展和保護，家庭扮演了世代間語言傳遞或轉變的關鍵角色（Fishman, 2001; Spolsky, 2009）。在英語為主流語言的國家例如澳洲，英語是優勢語，而華語則成為少數需要家庭刻意維護的語言。

King 等人（2008）定義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為，在家中與家庭成員明確且公開地規劃語言的使用規則。Spolsky（2004, 2009）指出，家庭語言政策包含三個相互關聯但獨立的元素，包括語言意識（language ideology）、語言使用（language practices）和語言管理活動（language management activities）。語言意識的組成是對語言價值和地位的信念。換言之，語言維護對促進家庭關係非常重要（Ruiz, 1984），同時也是情感的依戀和展示（Guardado, 2008; Pavlenko, 2004）。某些特定語言可能被視為資源，也可能被視為問題或某種權利（Hsu, 2007; Ruiz, 1984）。有的學者主張，轉向主流語言會加強兒童適應新語言環境（Barkhuizen, 2006），但也有學者認為，推廣雙語亦可成為良好的教育方式（King & Fogle, 2006）。

在維護母語的研究中，父母在家中使用母語溝通，對於維護母語扮演重要的角色（Dixon et al., 2012; Spolsky, 2009）。當父母有隱含或明確的語言形態意識，對加強雙語制的意願很高，就會透過語言管理來促進家庭語言實踐（Schwartz & Verschik, 2013）。對於家庭語言政策來說，語言管理者通常是父母或監護人，語言管理則由一個（父或母）或多個有效率的管理者（例如父、母、祖父、祖母等等）所執行。Spolsky（2009）的研究指出，家長會藉由控制家庭語言環境，例如規定何時該使用哪種語言，來管理語言的使用。父母因為注意到語言

問題，並且意識到語言可能會對於子女的未來有所影響，因此在能力可及的範圍之內，有計劃地實施語言調整政策，規定子女使用母語。澳洲的社會主要為單語心態，政府不僅主動阻斷官方對主流語言以外其他語言的支持，更還強力阻止英語以外的語言在私領域中使用。因此，從語言管理活動的角度，澳洲的華人父母通常主動以華語做為家庭裏的溝通語言，且也積極尋求讓小孩接受華語教育的機會，這些行為可以被視為對外部環境做出反應的內在力量（Eisenclas & Schalley, 2020）。

家庭管理活動的安排可涉及到不同的組織層級，從家庭領域開始，連續性擴展到本地的目標語言社群，甚至更廣。除了由父母來掌控家庭的語言使用之外（Spolsky, 2009），也還有很多管理語言的方法，例如將目標語的發言者帶入家庭，像是邀請祖父母同住，聘請說特定語言的保姆，招募說目標語言的青年到家裏寄宿等方式（Pauwels, 2016），也包含提供家庭語言資源如書籍、外語材料、網頁和網路影片（Little, 2020），利用網際網路或社群媒體與海外親屬溝通（Szecsi & Szilagyi, 2012），刻意生活在目標語使用者密集集中的社區（Fishman, 1991），安排小型的群體遊戲活動並邀請說目標語言的家庭參加（Spolsky, 2009）。也有家長會仰賴政府教育機構或政策的支持，讓子女就讀雙語或者沉浸式學校（García et al., 2006），或參加社區語言學校（Nordstrom, 2016），以便利用社區或政府的支持，培養特定的語言能力。

(4) 身分認同

本研究所探討的身分認同聚焦於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屬於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討論的範疇（Ashmore et al., 2004），即個體對自身的評價與歸類，而不探討社會對具有某些特色個體的歸類與期待。本研究採取 Sussman（2010）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文化認同模型（Cultural Identity Model），探討跨國文化衝擊對自我認同轉變的歷程，考量認同的凸顯性（identity salience）、社會文化適應狀況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文化認同的改變 (cultural identity change) 等因素與之間的交互作用，由一開始的文化認同到後來意識到文化差異，經歷個體的調整與適應過程，自我概念的震盪、自尊的穩定與澄清化過程，對自我的認同轉變 (identity shift) 可能是負向、或正向、肯定、或甚至更國際化，最終反映於個人的返遣情感 (repatriation affect)。

過去文獻中提出過許多與身分形成相關的因素，包含對目標語言及文化的態度、語言使用的社會環境、與目標語講者接觸的頻率、對目標語言文化接觸的頻繁程度、人際關係例如社交網絡或人脈的多寡、語言習得的年齡、語言能力、對文化的依附程度等等 (楊智翔, 2006; Ashmore et al., 2004; De Houwer, 1998; Diaz, 2014; Quintana, 2012; Sussman, 2010)。其中楊智翔 (2006) 針對澳洲的臺灣家庭進行深入訪談，發現對年輕移民而言，華人文化下父母主導性更強勢。因此家庭所給予的限制、對於交友或者生活方式的期待，從求學階段一直到出社會，都對年輕一代的移民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使得他們的語言能力可能介於兩者之間，華語不如在臺灣長大的華人，但英語也不如英語的母語人士。但以文化認同而言，年輕移民普遍認為移民的多元文化背景是自己的優勢，有利於他們到亞洲國家工作。

對於在異國生活的旅居人士而言，身分認同是影響生活的重要因素。Quintana (2012) 的研究顯示，由於美國的人口組成包含多國的移民，這些移民的第二代，剛開始對於自身的認同是以膚色區分。即使生活在同樣的社區，上一樣的學校，由於膚色的差異，具有少數膚色例如亞裔的學童不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待幼童逐漸發展出理解他人及自己觀點的認知能力，才會逐漸捨棄以膚色界定自身國籍的作法。該文作者在美國的小學請學童判斷自己的國籍，並比較韓裔移民與墨西哥裔移民的答案，發現由於當地的多數人為白種人，膚色與白種人差異越大的，越不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若比較小學不同年級學童的答案，高年級的學童比低年級的學童更傾向認同自己是美國人，但韓裔因為膚色、種族比起墨西哥裔與白種人差異較大，觀點轉

移的時間更晚，也就是韓裔比墨西哥裔的學童要到更高年級，更晚才會認同自己的美國國籍。但整體而言，國籍認同會隨着年紀與經驗而成長，而種族或膚色差異的影響會隨年紀增長而淡化。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可知，在單語的環境下要維持華語教育，需要家庭付出額外的努力，但在過程中除了語言能力的改變，也會同時引發身分認同現象，而個人對於文化的認同感也會促使個人調整自己的特徵（例如語言）。為了進一步探究這樣的現象，本文以問卷與訪談的方式，調查往返於澳洲與臺灣的家庭成員在家庭裏的語言選擇和使用狀況，以及家庭中的母親對於往返兩國之間維繫語言與文化的看法。

三、研究方法與結果

本研究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發放問卷，邀請雙語家庭填答，以便調查具旅居現象的家庭佔比，對語言維護的看法，並徵詢參與訪談的意願。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中勾選願意接受訪談的家庭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已通過澳洲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以下分別介紹。

(1) 家庭語言問卷調查

1. 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旅居澳洲、具亞洲背景的雙語家庭（並非只針對華人）。填答者為父母。共收集到 61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44 份。

2. 研究材料

問卷內容分兩部分，前部分針對家庭中的每位成員詢問基本資料，例如出生地、母語、年齡、澳洲居住時間長度、教育程度、就業情況、對於母語和英語的聽、說、讀、寫掌握度評分等，主要以選擇題的方式填答。第二部分以開放式簡答題詢問家庭的語言使用狀況，例如父母之間溝通使用的語言、父母與子女交流使用的語言，每位子

女的語言使用狀況，讓子女接受母語教育的管道、方式、原因。以上問卷目的在於確定父母對於語言的意識形態，語言實踐、母語管理等細節，包含對主流語言、家庭語言、文化價值，以及對子女的期望。問卷的最後一部分是有關家庭語言的管理，例如為了教育目的實行旅居等情況。最後，問卷也詢問家長是否有意願參與後續訪談。

3.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在 2017 年 2 至 4 月透過廣告與邀請函等途徑招募參與者在網路上填答問卷，包含邀請澳洲的學校在校方的新聞通訊中宣傳、發送電子郵件、週末親至中文學校發傳單、在社交媒體網站如臺灣的批踢踢實業坊紐澳版張貼公告、親朋好友之間轉發廣告等等。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所收集到的 44 份有效問卷中，父母至少有一方來自臺灣有 21 份。這些臺灣家庭中，約半數的受訪者（10 人）表示其子女有回臺灣旅居的經歷，可見旅居現象並非少數。

在問卷中有兩個問題詢問父母對家庭語言維護的態度和看法。問題是：

- 1) 為什麼您希望您的孩子能熟練掌握英語以外的語言？(Why do you want your child/ren to be competent in th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 2) 您在維持英語以外的語言方面面臨哪些挑戰？(What are the challenges you face in maintaining th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我們蒐集到的答覆支持了 Zhu 和 Li (2016) 的觀點，顯示跨國移民父母對於語言維護受到不同因素的激勵，包括文化身分認同、文化聯繫、與家庭成員和社區的交流以及未來潛在經濟上的機會。部分英文回答原文評論如下（引號內為參與者代碼與中譯，其中參與者 i01 願意接受後續訪談）：

· Because we believe there are advantages for them to be bilingual. Also to maintain the links to the cultures. Know and appreciate the cultural

heritage. (i01：因為我們相信讓他們有雙語能力會對他們有優勢，也要保持文化的聯結、了解和欣賞我們的文化遺產。)

-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grandparents & relatives & people back in Taiwan. (i07：能夠與在臺灣的祖父母、親戚等人交流。)

-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my families in Mandarin. (i08：他們需要用國語和我的家人溝通。)

-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my family in home country /have better chance in work. (i13：能夠與家鄉的家人交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然而，他們在維持華語文化傳承和實現中英雙語也面臨了重大挑戰。我們發現若將子女的年齡分組，他們的華語能力在幼時較佳，但中學以後，英語能力會優於華語。這種雙語競爭現象在美國的西班牙裔雙語者身上也有被觀察到 (Quiroz et al., 2010)。子女花在英語的時間越多，華語的詞彙量就越少。這在英語為官方語的國家，似乎是無可避免的現象。因為華語並非容易學習的語言，特別是對於這些華裔學習者，認讀及寫作技能是一大難關。

此外，在以英語為主導的環境中生活和上學，極少有機會可使用華語。正如 Wilson (2020) 也提到的，雖然子女對學習和保持傳統語言持正面的態度，但他們更喜歡在講英語的環境中使用英語。如果父母本身有至少一方不精通華語，無法幫助子女在家裏保持和使用更多的華語，那麼子女即使接受雙語教育，實際要使用華語依舊非常困難。在我們的案例中，大多數父親都是說英語的人，無法按照個人的家庭語言政策和實踐貢獻他們的知識來支持子女使用華語，也無法用華語和子女交流。跨文化的父母之間的教育觀也有所不同，例如社區華語課程通常都在課後或週末，子女對比其他同學可能會覺得這些時間應該是休息的假期，而父親可能也會抱持相同的想法，而使華語的學習更受挫折。

(2) 深度訪談

1. 研究對象

透過第一階段的問卷，得知有 10 組臺灣家庭有回臺旅居的經驗。這些參與者中有 8 人願意接受深度訪談，但因為有 2 人的子女已經 20 多歲，不同時間背景可能會無法讓數據結果聚焦，故最後參與訪談的是 6 位臺灣出生、定居在澳洲昆士蘭省布里斯本的母親，子女年齡介於 5-10 歲之間，訪臺就學的期間介於 4-10 歲間。由於子女年齡尚小，無法完整表達他們的經驗和觀點，而母親通常對子女的觀察較細微，對於訪談的參與意願也通常高於父親，因此以母親作為進一步訪談的對象，並未與幼童面對面訪談。

受訪者的子女皆在澳洲以及臺灣的學校兩地接受正式教育，加上當他們在臺灣時，不單純只是待在親戚家探親，而是進入正規學校例如幼兒園或國小上課，因此他們可以提供更深入的比較兩地教育體驗。表 1 提供了參與訪談家庭的背景資料。出於保護參與者隱私，後續文章中出現的表格和母親陳述皆以假名取代真實姓名。

表 1：參與訪談家庭的背景資料

代號	學童性別	學童年齡	訪臺頻率	就讀臺灣的學校			與家長溝通的語言		陪同遊學成人
				次數	時長	就讀年級 (就讀時年齡)	母親	父親	
高女士	男	8 歲	每年	三次	四週	一：幼稚園 二：一年級 三：二年級	華語／ 英語	英語	母親
安女士	女	7-8 歲	每年	三次	四週	一：幼稚園（4 歲半） 二：幼稚園（5 歲） 三：一年級	華語	英語	母親
劉女士	男	10 歲 ^a	每年	一次	四天 (試行)	六年級 ^b	華語	英語	母親
文女士	女 男	8-9 歲 ^a 6-7 歲 ^a	僅一次	一次 一次	六週 六週	二年級 一年級	華語	華語	母親

[接上表]

代號	學童性別	學童年齡	訪臺頻率	就讀臺灣的學校			與家長溝通的語言		陪同遊學成人
				次數	時長	就讀年級 (就讀時年齡)	母親	父親	
沙女士	男	10 歲	僅一次	一次	兩週	國小 ^c (8 歲)	華語	華語	母親
梅女士	男男	7 歲 5 歲	每年 每年	三次 兩次	四五週 四五週	幼稚園 幼稚園	華語	英語	母親，僅一次與父親

附註：^a 由家長提供的澳洲年級推估學童年齡。^b 當時在澳洲就讀 Year 4，但為了與表親同班，旁聽國小六年級的班。^c 可能是國小二或三年級，家長未明確說明。

如表 1 所示，有三個家庭經常往返兩地就學，而另外三組於數據蒐集至今僅有過一次相關經歷。即便如此，這三個家庭也表示計劃未來每年將繼續實行旅居求學活動。

參與訪談的六位母親中，有三位是家庭主婦，三位擔任公立中小學的教師義務助理，皆具學士學位，在澳洲居住超過十年，年齡介於 36 至 45 歲之間，能靈活使用英語。其中兩位的配偶來自臺灣，其餘幾位的配偶則來自澳洲、紐西蘭、英國。這些家庭的丈夫均有高等教育學位，父母的教育水準都很高。

2. 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在 2017 年 6-7 月與受訪者面對面或透過電話進行深度訪談。每受訪者訪談一次，約 40 至 60 分鐘。訪談的主要語言為華語，但配合受訪者的回答伴隨頻繁的中英語碼轉換，並依據受訪者的回答進一步提問。

3. 訪談內容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化深度訪談，內容延伸問卷中提出的開放式題目，探索家庭內的語言維護策略，例如維持華語的做法。訪談的另一重點是探索身分認同，透過分析例如子女對於旅居活動的反應、兩地之間往返教育所面臨的挑戰、旅居結果與家長最初期望的比較，以及對有類似想法的父母提供建議。

4. 資料編碼與分析

訪談數據先經由聽寫記錄成為語料，然後使用主題分析法（Braun & Clarke, 2006），基於參與者訪談中的主題和類別，探討最為突出的主題。這些主題涉及母親為子女尋求旅居經歷的動機及語言、社會和情感的影響。

5. 研究結果

依據語料的主題分析分為語言維護與身分認同。以下我們將逐一說明。

5.1 語言維護與發展

回臺灣接受短期教育的最重要理由，也就是所有受訪者都提到的原因，是為了培養子女的華語能力。每位受訪者都期待讓子女認識講華語的朋友，增加使用華語對話的機會，而最終成果也大致符合家長最初的期待。母親們一致認為，遊學經歷有助於進一步開發子女的語言能力，華語能力進步的速度也超越了孩子在澳洲長期學習下通常能取得的水準。除了口語能力之外，訪談中提及的具體語言成果還包括提高識字能力。其中一位受訪者說，她看到孩子的寫作和閱讀能力因為回臺灣學習之後而有所提高，感到特別欣慰，因為在澳洲，她和丈夫很難在家裏教導或培養女兒這兩方面的能力。也有母親表示，兒子回到澳洲以後會用華語問候社區內的華人，這是他在遊學之前沒發生過的事。還有受訪者說，兒子在返回澳洲後，會主動繼續學習華語，也會主動說華語。「回來以後，他確實中文進步很大。他現在會主動跟人家打招呼。」（劉女士）

雖然大多數的子女在臺灣有足夠的語言和交際能力，並且在澳洲也持續學華語，但他們的語言能力還是不能與同齡的臺灣孩子相提並論，特別是在讀寫能力上。沙女士表示，孩子因為語言能力不足，加上有限的文化理解能力，可能導致他在與人交談中感受到對方不耐煩的情緒，從而感到沮喪，與同學發生衝突。受訪的家庭無論是透過課外的週末華語社區學校或是家中聘請的私人教師，都事先在澳洲接受正式的（有老師教授的）華語教學。額外的華語訓練才能確保子女

在華語地區的旅居期間能夠達到足夠的對話能力。即使如此，子女要跟上臺灣的課業也依舊吃力，但至少，足夠的華語能力能降低子女在臺就學發生不愉快經歷的機率。此外，旅居活動也需要父母雙親的支援。過往的研究數據顯示，即使雙親其一方只說社會主流的單一語言（英語），家長也可以積極使用策略而培養並發展家中的弱勢語言（Venables et al., 2014）。我們的受訪者中有兩位父親曾陪同母親和子女一起到臺灣，其中一位並不懂華語，在那次教育之旅中，根據母親的敘述，孩子並沒有完全沉浸在華語環境中，子女的學習經驗就不如母親自己帶著孩子回臺學習時那麼積極，也就是缺少父親對華語的積極主動，華語的維護就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負面影響。

面對兩地就學的狀況，母親提前讓子女了解學業上的差異，並表示對於子女在臺灣的學業期望並沒有很高。她們不會要求子女有很好的考試成績，即使有家長表示希望子女能夠應付學校的課程，因此要求子女在臺灣短期學習期間完成學校分配的所有任務，但其主要目標還是希望子女不會厭惡華語。換句話說，家長期許接受雙邊的教育能促使子女產生對華語的積極態度，進而提高使用與學習華語的動機。從宏觀的角度看來，學校的任務能夠提高學生對華語的熟練程度，因此被視為額外的收穫和獎勵。

以上六位受訪者的描述中，五位表示打算或已經計劃定期性重複臺澳兩邊往返的教育活動，可見旅居活動對於維護華語產生正面、有效的影響力，因此讓母親願意再次重複這樣的活動。依據文化認同模型（Sussman, 2010），如此正向返遣的情感屬於國際化認同轉變（global identity shift）。

5.2 兩地教育系統間之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也對子女帶來衝擊。沙女士表示，小孩在臺灣期間公開反叛，拒絕上學，原因是他們唯一回臺灣就學的機會就是澳洲學校的長假，孩子認為假期就是假期，不應該上學。另一個問題是，「因為那邊都是 7 點就要上學了，所以早上起不來，都會遲到，所以遲到是個大問題。他有點痛苦。」孩子曾多次問她：「為什麼我回到這裏還要上

課？不想上課不想上課！」質疑無果的情況下，他在臺灣的學校就拒絕依照老師的指示。最後，雖然本來母親計劃讓兒子就學四週，但最終僅在嘗試兩週後，不得不終止兒子在臺灣學校學習的機會。

除了語言和文化，在體制和課程設計上，兩地也呈現很大的差異。例如安女士表示，她的女兒不明白臺灣教育系統中的考試或小考是什麼意思。在就讀幼稚園的時候，「她會說：『為什麼臺灣的小孩都在念書呢？I miss my kindy in Australia.（我想念澳洲的幼兒園）』我說為什麼，她說：『因為都是在吃和玩』。」劉女士也反映，兒子在臺灣學習期間試圖與別人打招呼，但遭到誤解。她認為原因與身分認同及文化衝擊密切相關，她也嘗試與兒子解釋這一文化衝擊：「在澳洲打招呼會擁抱，在臺灣不行，尤其是對女生，小朋友電視劇看得多，會覺得你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雖然兩地的教育風氣帶來衝擊，受訪者表示子女發現在臺灣上學有唸書的壓力，相較之下，在澳洲上學輕鬆很多，但兩地交換教育的模式也有助於培養兒童的社會文化理解能力，體驗不同文化，從而提高他們的跨文化生存能力。例如受訪者安女士提到，回到臺灣的老家有佛堂，女兒自然而然就跟着家人去唸佛拜拜，在澳洲則很少接觸到佛教的文化。也有受訪者提到，兩種教育制度對學生的要求很不同，例如劉女士表示這體現在對老師的稱呼不相同，她也會提醒兒子如何應對這一差異，比如：「澳洲不會有叫老師的，他剛去就問我為什麼都叫老師。還有在澳洲跟老師沒有什麼階級的不同，但是在那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此外，在澳洲教室由老師打掃，但在臺灣，學生要自己吃完飯、擦桌子，還要幫老師掃地。這種文化與其衍生潛在規矩的差異，如劉女士表示，「我覺得還是應該要體驗一下。當你跟孩子說自己的過去上學經歷的時候，孩子就可以有個 recall（回憶），是個真實的情景。另外，接受刺激之後，他會自己反省，他會覺得他在澳洲是非常幸福的。」

5.3 身分認同之跨文化適應

兩地交換教育的模式促使子女認識到文化差異，能夠成功進行調

整與適應的子女，最終可導向肯定或國際化的認同轉變。例如高女士提到，她和兒子在臺灣旅行的時候一起經歷許多有趣的事情，因此使兒子對於回臺灣，配合參與兩地旅居的教育活動有更強的意願，也讓他更加期待下一次的臺灣之行，「到現在，他還會記得我帶他去的那些地方，他就會跟他爸爸說：『我好想再去那個地方』。」但他用「那個地方」來指臺灣，可見他對臺灣沒有歸屬感。高女士後來解釋說，在臺灣時，她兒子明確知道自己與臺灣人不同，這有可能是由於他自身感覺沒有被臺灣的同學接納。「他（指高女士兒子）覺得 he 自己是澳洲人，他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樣」。就種身分認同的挑戰可能與臺灣的學校同學態度有關，對臺灣學生來說也是一種自身身分認同的保護，以及在這過程中他們對文化衝擊的反應。而和高女士的兒子一樣，有些受訪者的子女是混血兒。當小孩去學校時，其他孩子會稱他為「外國人」，這令孩子尷尬和不安。這種情況雖然偶爾會發生，但身分認同問題也是這些子女的挑戰。安女士提到臺灣學校的同學問女兒來自哪裏的時候，「她不會說她是澳洲或是臺灣，她都說她是一半一半。人家問她哪裏來的，她就說『澳洲』。她不會說她是澳洲人。她這個還是蠻清楚的。」

受訪母親積極培養子女產生國際化的身分認同轉變，並有意再次進行兩地旅居的教育活動。歸納得出的原因，家長預先規劃與替子女預先建立心理建設是重要的因素。例如在臺澳兩地受教育，並不是任何一個在澳洲的家庭都可以如此安排，在海外出生，具有臺灣背景的子​​女需要先申請加入臺灣籍（澳洲籍以外），因為只有具臺灣戶籍的子​​女才可以在臺灣接受義務教育。在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有一戶中國大陸移民，在簡答題中回應由於中國大陸不允許雙重國籍，入澳洲籍的華裔子女若回大陸就學，必須按外國人般付出高額的學費，而「臺灣上學一毛錢都不要，因為雙國籍，這個是它的福利。」（安女士）。其次，父母需預先與兩地的學校行政主管、教師、甚至當地的社區委員協商、爭取支持。因此，有的家長（文女士、安女士為例）在決定帶孩子回臺灣前，提前九個月就開始與臺灣的教育單位和委員溝通，

在臺灣學校開學前一個月，也還再次聯絡以保證萬無一失。因此，兩地就學教育的成功，一部分須建立於學校老師和家長之間良性的合作關係。

四、討論與結論

(1) 討論

King 和 Fogle (2006) 在為兒童提供熟練掌握外語機會的背景下，提出以雙語育兒是「良好的家庭教育」。這點在我們的問卷中也得到呼應，大部分家長回答為何要讓子女接受華語教育，都與「提升競爭力」有關。我們猜測，由於在澳洲的臺灣人超過百分之 70 的人口年紀在 44 歲以下，且接近 50% 的社區擁有學士以上學位（約佔澳洲總人口的 20% 左右）（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2013），因此澳洲的臺灣社區應該比當地居民更重視教育。華語是澳洲使用人數最多的少數民族語言（佔人口 2.5%）（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7）。由於中國是澳洲主要貿易夥伴之一，所以或許華語在澳洲也被視為重要的社區語言。以上種種因素，可能使澳洲的華人也刻意想要維持華語，作為未來子女求職或工作的優勢。

在目前的討論中，我們期望孩子在臺灣遊學期間，不僅可以體驗語言學習和交流的發展，還可以逐步接受、認同臺灣的社會文化。所有的受訪母親在提到她們來往臺灣和澳洲的旅行歷程都使用華語的動詞「回家」。這個詞其實表明了母親對於臺灣有着共同的歸屬感。然而，多數子女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是臺灣人。過去研究自幼移民澳洲至完成大學學士以上教育後，回臺尋求工作的青年也有類似發現，許多年輕移民自認非澳洲人也非臺灣人（Chiang & Liao, 2008）。但與 Chiang 與 Liao (2008) 不同的是，該研究的年輕返臺移民感覺與同儕有疏離感，對於自我概念較模糊，產生負向的身分轉移。但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沒有移居臺灣的打算，甚至為了幫助子女順利在臺灣上學，他們會預先介紹自己為「來自澳洲的客人」或描述女兒為多種族。他

們有繼續旅居兩地就學的意願，顯示面對文化衝擊之後，經過適應，自我概念愈來愈清晰，因此轉為正向的身分轉移。即使有時候衝突會造成更高的自我概念紊亂（self-concept disturbances），這是由於自尊較高、自我概念清晰所致（Sussman, 2010, p. 77）。例如有母親對於兒子被貼上「外國人」的標籤感到氣憤，並且試圖透過譴責來教育那些用標籤形容她兒子的孩子。

我們也發現研究對象的父母種族組合和身分認同有關。我們訪談的六位母親中有四位配偶是白種人，他們的子女因此外觀上較像白人，在臺就學時同學對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理解要求就會降低甚至會主動提供協助，在身分認同上他們也認為自己是澳洲人，而另兩位華人配偶的子女因為外觀上與臺灣的學生無異，在臺就學期間遇到較多的挫折，因為老師和同學對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理解期待較高，這樣的結果與過去文獻探討同樣種族膚色的人對自我國籍歸類的影響不謀而合（Quintana, 2012）。

從外語學習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探討的對象在外語學習的環境經歷了三種轉變。起初發生在以單一英語為官方語的強勢語言環境下，家長以主流官方教學以外的方式，試圖讓子女學習另一個非主流語言。有些家長送子女去私立的華語學校上額外課程，或者聘請華語家教，努力營造出華語的學習環境。待家長把子女送到臺灣的親戚家住宿學習時，語言環境從英漢兩種語言轉變為單語的沉浸式教學環境。即使子女習慣說英語，但沒有與他用英語交談的對象，被迫使用不熟悉的單語。之後這些子女結束假期回到澳洲，又回復之前的英語為主，華語為輔的模式。所以旅澳家庭的雙語教育像是連續性的轉換，從類似雙語的兩種語言教育轉為華語沉浸式教學，再轉回兩種語言並行的教育，如此循環。但為了鼓勵子女、增加子女學習華語的意願，也可能礙於經濟和環境的有限資源，家長對於子女的華語程度要求普遍較為寬鬆。有家長表示只是要讓子女有華語的體驗，因此即使子女的華語發音不如母語人士般標準，或者用詞不夠精準，只要能夠達到溝通的目的即可。此種對語言教學的態度比較接近外語教學的世界英

語概念，也就是以跨語言溝通為主要概念的華語學習。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全部是母親，子女並未參與訪談，因此本研究代表的是臺灣母親的觀點，並不能直接代表子女的看法，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受訪對象的子女由於尚就讀幼兒園或國小，身分認同架構中（Sussman, 2010）的個體的文化認同主體性（cultural identity centrality）和文化彈性（cultural flexibility）仍處於發展階段，對於文化認同的反應（cultural identity response）尚未成形。未來的研究方向可追蹤這些子女的成長，再從子女的觀點，討論旅居狀態與兩地就學經驗對他們的語言維護與身分認同的影響。

(2) 結論

本研究探討在澳洲與臺灣兩地接受教育的子女對語言學習態度以及身分認同的影響。本研究起初把短期旅居視為一種個人行為。然而，在深入訪談後我們發現，本文所研究的對象，即首訪母親，對於臺灣有着思鄉的熱情。因為雖然在臺灣就學不用付出高額的學費，但是為了讓子女從澳洲到臺灣就學，家長需要負擔相當大的財務壓力，包括機票、在澳的華語課程費用、為在臺灣上學而做的準備工作、在臺灣期間的澳洲工作收入損失，還有犧牲澳洲假期等等。成功的短期旅居不屬於個人行動，而是需要多方配合的一種教育活動：父母、兩地的學校和教師、兩地社區，三者間建立一種夥伴關係。如果沒有這種夥伴關係，兩地就學的旅居體驗就無法實現。

對於旅居國外的族群而言，本研究顯示出家長普遍對於子女的華語表現寄予厚望，更希望藉此培養子女的國際觀與競爭力。但實際訪談也發現，在澳洲如此以英語為官方語的國家，雖然華人佔該國移民比例的前列，但家長為了維持華語必須承擔相當大的經濟負擔，聘請家教、上華語或者雙語學校，甚或返回臺灣讓子女在兩地之間接受教育。以語言維護的表現而言，華語在家長的努力下得以保持口語能力，待到中學之後，由於字彙難度提高，缺乏華語閱讀和寫作環境的情況下，子女的華語寫作和閱讀的能力較弱。語言也是塑造個人身分

認同的因素之一。使用兩種語言，並在兩國之間往返的族群，不斷面臨文化的碰撞，尤其對學齡前、幼兒園或小學的學童而言，同學的反應會引發學童對於自己身分認同的質疑。研究發現，學童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一開始由排斥逐漸轉為接受自己擁有的多元文化。相比父母輩對臺灣有懷舊思鄉的情緒，移民的第二代傾向認為自己是澳洲人。

對於臺灣的教育者而言，當政府鼓勵國際化、推行雙語教育的同時，有這批來自英語國家的「臺灣人」回臺就讀。學校的老師、行政人員、還有同學，如能善待這些同學，提供情感的支持，可以互相學習到不只是語言，還有文化的交流，藉此培養國際觀。過去的雙語研究也顯示，成功的雙語教育還需奠基於母語和非母語人士之間的交流 (De Jong, 2002)。也就是說，正向的跨文化學習也會提升雙語學習的效果。如果同學或同校的老師能夠體認到這些家長為了送小孩到臺灣受教育所付出的努力，或許這些孩子就比較不會產生排斥或者異化的身分認同，而對於在臺灣的學童來說，這些短暫來訪的同學可以幫助他們培養文化素養，對於他們未來的人際相處發展也是利多於弊。

參考文獻

- 楊智翔 (2006) :《澳洲臺灣年輕移民生活適應與身分認同過程之探討—以墨爾本為例》[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r8692j>
- Ashmore, R. D., Deaux, K., & McLaughlin-Volpe, T. (2004). An organization framework collective identity: Articul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ultidimensiona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1), 80-11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0.1.80>
-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7). 2016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General community profile. Retrieved on June 28, 2021 from [https://www.censusdata.abs.gov.au/CensusOutput/copsub2016.NSF/All%20docs%20by%20catNo/2016~Community%20Profile~036/\\$File/GCP_036.zip?OpenElement](https://www.censusdata.abs.gov.au/CensusOutput/copsub2016.NSF/All%20docs%20by%20catNo/2016~Community%20Profile~036/$File/GCP_036.zip?OpenElement)
-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2013). Australian curriculum: Languages Chinese (revised). Retrieved on June 28, 2021 from http://docs.acara.edu.au/resources/F-10_Australian_Curriculum_Languages_-_revised_Chinese_-_Nov_2013.pdf
- Barkhuizen, G. (2006). Immigrant par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language practices: Afrikaans speakers living in New Zealand. *Language Awareness*, 15, 63-77. <https://doi.org/10.1080/09658410608668851>
- Barron-Hauwaert, S. (2011). *Bilingual siblings: Language use in families*.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47693280>
- Braun, V., & Clarke, V. (2006).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3(2), 77-101. <https://doi.org/10.1191/1478088706qp0630a>
- Chen, K. H. Y. (2008). Positioning and repositioning: Linguistic practices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overseas returning bilinguals in Hong Kong. *Multilingua*, 27(1-2), 57-75. <https://doi.org/10.1515/MULTI.2008.004>
- Chiang, L.-H. N., & Liao, P.-C. S. (2008). Back to Taiwan: Adaptation and self-identity of young Taiwanese return migrants from Australia. *Population Studies*, 36, 99-135. <https://doi.org/10.6191/jps.2008.4>
-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 351-375. <https://doi.org/10.1007/s10993-009-9146-7>
- De Houwer, A. (1998).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parent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 G. Extra & L. Verhoeven (Eds.), *Bilingualism and migration* (pp. 345-362). Walter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807820.75>
- De Jong, E. J. (2002). Effective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eory to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 two-way bilingual program.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26(1), 65-84. <https://doi.org/10.1080/15235882.2002.10668699>
- Diaz, D. L. (2014). *Bilingualism as a first language and its effects on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Master's thesi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ttps://hdl.handle.net/10211.3/135748>
- Dixon, L. Q., Zhao, J., Quiroz, B. G., & Shin, J.-Y. (2012). Home and community factors influencing bilingual children's ethnic languag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6(4), 541-565. <https://doi.org/10.1177/1367006911429527>
- Eisenclas, S. A., & Schalley A. C. (2020). Early languag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In M. Schwartz (Ed.), *Handbook of early language education* (pp. 1-26). Springer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Education.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47073-9_26-1
- Falicov, C. J. (2005). Emotional transnationalism and family identities. *Family Process*, 44(4), 399-406.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5.00068.x>
- Fishman, J.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 A. (2001).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vice versa): Review, reconsideration and reiteration.

- In J. A. Fishman (Ed.), *Can threatened languages be saved* (pp. 451-483).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7060-021>
- García, O., Skutnabb-Kangas, T., & Torres-Guzmán, M. (Eds.). (2006). *Imagining multilingual schools: Languages in education and glocaliz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8968>
- Guardado, M. (2008).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Canadian Hispanic communities: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https://doi.org/10.14288/1.0066332>
- Hsu, W. (2007). English-only/official vs. bilingual education/bilingual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67, 219-247. <https://doi.org/10.6258/bcla.2007.67.09>
- Ip, D., Wu, C., & Inglis, C.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Review*, 22(1), 79-97. <https://doi.org/10.1080/10357829808713188>
- King, K., & Fogle, L. (2006). Bilingual parenting as good parenting: Parents' perspectives o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for additive bilingu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9(6), 695-712. <https://doi.org/10.2167/beb362.0>
- King, K., Fogle, L., & Logan-Terry, A.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07-922. <https://doi.org/10.1111/j.1749-818X.2008.00076.x>
- Koga, N. (2009). *Growing student identities and school competences in sojourning: Japanese children's lived experiences acros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Boston College]. <https://dlib.bc.edu/islandora/object/bc-ir:102031>
- Lanza, E. (2007).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family. In P. Auer & W. Li (Eds.), *Handbook of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 (pp. 45-67).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8553.1.45>
- Lao, C. (2004).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Chinese-language use.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28(1), 99-121. <https://doi.org/10.1080/15235882.2004.10162614>
- Levitt, P., & Jaworsky, B. N. (2007).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1), 129-15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33.040406.131816>
- Li, W. (1994). *Three generations two languages one family*. Multilingual Matters.
- Little, S. (2020). Whose heritage? What inheritance?: Conceptualising family language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3(2), 198-212.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7.1348463>
- Mu, G. M., & Dooley, K. (2015). Coming into an inheritance: Family support and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8(4), 501-515.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4.928258>
- Nordstrom, J. (2016). Parents' reasons for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Insight from a high-shift, non-visible, middle-class community. *Language and Education*, 30(6), 519-535. <https://doi.org/10.1080/09500782.2016.1168431>
- Pauwels, A. (2016).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07338869>
- Pavlenko, A. (2004). Stop doing that, ia komu skazala!: Emotions and language choice i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5(2-3), 179-203.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0408666528>
- Quintana, S. (2012). Sojourner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ity. *IJEP-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1), 14-34. <https://doi.org/10.4471/ijep.2012.02>

- Quiroz, B. G., Snow, C. E., & Zhao, J. (2010). Vocabulary skills of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 Impact of mother-child language interactions and home language and literacy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4(4), 379-399. <https://doi.org/10.1177/1367006910370919>
- Reed, B. (2015). Wild geese families: Stress, loneliness for South Korean families heading overseas to gain edge in 'brutal' education syste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bc.net.au/news/2015-06-16/thousands-of-south-korea-families-apart-for-australian-education/6547604>
- Ruiz,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 15-34. <https://doi.org/10.1080/08855072.1984.10668464>
- Salaff, J., Shik, A., & Greve, A. (2008). Lik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ong Kong: The retur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China Review*, 8(1), 31-57. <https://www.jstor.org/stable/23462260>
- Schechter, S. R., & Bayley, R. (1997). Language socialisation practic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Case studies of Mexican-Descent families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TESOL Quarterly*, 31(3), 513-541. <https://doi.org/10.2307/3587836>
- Schwartz, M., & Verschik, A. (Eds.). (2013). *Successful family language policy: Parents, children and educators in interaction*.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7753-8>
- Searle, W., & Ward, C. (1990). The predic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justment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4(4), 449-464. [https://doi.org/10.1016/0147-1767\(90\)90030-Z](https://doi.org/10.1016/0147-1767(90)90030-Z)
- Shin, S. J. (2004). *Developing in two languages: Korean children in America*.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53597480>
- Smith, S. A., & Li, Z. (2020). Closing the enjoyment gap: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motivation and reading attitudes among Chinese-America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5(3), 1070-1087.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20.1742653>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5245>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6470>
- Sussman, N. M. (2007). Identity shifts as a consequence of crossing cultures: Hong Kong Chinese migrants return home. In *East-West identities* (pp. 121-147). Brill. <https://doi.org/10.1163/ej.9789004151697.i-404.46>
- Sussman, N. M. (2010). *Return migration and identity: A global phenomenon, a Hong Kong cas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5790/hongkong/9789888028832.001.0001>
- Swagler, M. A., & Ellis, M. V. (2003). Crossing the distance: Adjustment of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Psychology*, 50(4), 420-437. <https://doi.org/10.1037/0022-0167.50.4.420>
- Szecei, T., & Szilagy, J. (2012). Immigrant Hungarian families' perceptions of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heritage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5(3), 265-281. <https://doi.org/10.1080/07908318.2012.722105>
- Venables, E., Eisenclas, S. A., & Schalley, A. C. (2014). One-Parent-One-Language (OPOL) families: Is the majority language-speaking parent instrumental in the minority languag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7(4), 429-448.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3.816263>
- Ward, C., & Kennedy, A. (1994).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8(3), 329-343. [https://doi.org/10.1016/0147-1767\(94\)90036-1](https://doi.org/10.1016/0147-1767(94)90036-1)
- Ward, C., Bochner, S., & Furnham,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2nd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070696>

- Wilson, S. (2020).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rough the eyes of bilingual children: The case of French heritage speakers in the UK.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1(2), 121-139.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9.1595633>
- Wu, C.-T., Ip, D. F., Inglis, C., Kawakami, I., & Duivendoorn, K. (1998).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A comparison of settlers from Hong Kong, Taiwan and China. In E. Sinn (Ed.),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pp. 391-422).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t2jbxth>
- Zhu, H. (2008). Duelling languages, duelling values: Codeswitching in bilingual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alk in diasporic famili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1799-1816.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08.02.007>
- Zhu, H., & Li, W. (2016).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aspiration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7), 655-666.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15.112792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Identity of Families with Taiwanese Background in Australia

TSAI, Pei-Shu* QI, Grace Yue EISENCHLAS, Susana A. SCHALLEY, Andrea C.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sojourning activity on children in term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awareness for families with Taiwanese background who migrated to Australia and sent their children back to Taiwan to receive formal education during school holidays. The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to explore language usage in the families and the reasons to maintain a biling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The study then interviewed the parents about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of the children and explore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the children during the journey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alia. Although only mothers were willing to b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ents themselves were persistent in their nostalgia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but that children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self-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and languages. The goals of the parents with this sojourning activity were not only to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Chinese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to increase and foster children's identification with Taiwan.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s revealed that the children had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own personal identity,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one their parents aimed to achieve. By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Taiwanese families traveling between educational systems to and from Taiwan and Australia, this study

* TSAI, Pei-Sh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corresponding author)

QI, Grace Yue, School of Humanities, Media and Creative Communication, Massey University, New Zealand.

EISENCHLAS, Susana A., School of Humanities, Languages and Social Science,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SCHALLEY, Andrea C., Department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Karlstad University, Sweden.

aims to provide parents and language educators with some suggestions 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from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Keywords: language management, social identity, short-term sojourning, Australia, Mandarin